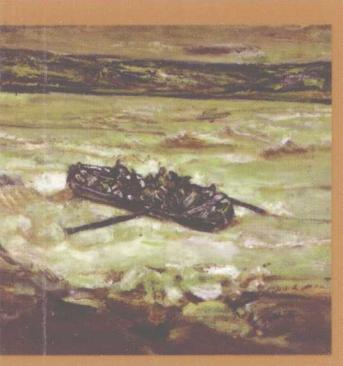


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丛书
武汉大学十五“211工程”项目



方长安◎著

冷战·民族·文学

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丛书
武汉大学十五“211工程”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冷战·民族·文学

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方长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 方长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9
(中外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丛书)
ISBN 978-7-5004-7964-2

I. 冷… II. 方… III. 比较文学—文学史—
研究—中国、外国—1949 ~ 1966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6146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0
字 数 232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冷战”语境与“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	
基本特征	(7)
第一节 中外作家非个人化交往	(9)
第二节 社会主义话语诉求与文学翻译	(11)
第三节 外国文学解读政治意识形态化	(15)
第四节 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关系特征	(17)
第二章 与欧美文学非直接交往关系 (22)	
第一节 特殊的“文学”活动	(22)
第二节 文学翻译	(25)
第三节 政治意识形态化解读概况	(29)
第四节 关于 19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讨论	(32)
第五节 “十七年文学”未受欧美资本主义文学影响的缘由	(40)
第三章 关于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言说 (45)	
第一节 波特莱尔“专辑”	(45)

冷战·民族·文学

第二节 “迷惘的一代”的译介	(52)
第三节 《夜读偶记》对现代派的矛盾言说	(57)
第四节 “内部发行”与公开述评	(61)
第四章 政治意识形态认同与中苏文学关系	(69)
第一节 文学交往与俄苏文学翻译	(72)
第二节 “十七年文学”方针、政策与苏联文学关系 ...	(82)
第三节 “十七年文学”运动与苏联文学关系	(97)
第四节 “十七年文学”理论与苏联文学关系	(107)
第五节 “十七年文学”创作潮流与苏联文学关系 ...	(125)
第五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十七年”的传播、接受	(134)
第一节 传播	(134)
第二节 解读	(144)
第三节 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	(152)
第六章 “十七年”与亚非拉的文学交往	(161)
第一节 亚非天空下的文学集会与交往	(162)
第二节 与拉丁美洲的文学交往	(176)
第三节 亚非拉文学翻译	(186)
第四节 文学集会、交往中诞生的文学	(193)
第七章 “十七年文学”在社会主义阵营和日本的传播 ...	(200)
第一节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新中国文学的传播	(200)

目 录

第二节 日本对新中国文学的传播	(209)
第八章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十七年文学”的绍介、		
言说	(218)
第一节 “十七年文学”运动论	(221)
第二节 毛泽东文艺论	(238)
第三节 现代重要作家转型论	(244)
第四节 文学创作论	(251)
第九章 “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嬗变的内在话语逻辑 … (268)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的取舍	(269)
第二节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焦虑与反思	(276)
第三节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调整	(280)
第四节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期的 新态势	(286)
结语 “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的经验教训	(292)
参考文献	(300)
后记	(314)

引　　言

在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上，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1966）中外文学关系，受世界“冷战”格局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本质诉求影响，头绪繁多而又特点鲜明。在“十七年”对外文学关系中，新中国不仅向世界表明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学立场，而且展示了新的文学成就；不仅与许多国家、地区对话，交流社会主义文学想象、创作经验，而且受政治上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影响，以文学为平台，向世界表述了中国在复杂的“冷战”格局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与文化认同。“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同新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特别是同新的文学运动、思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重要关系，缺乏足够的重视与研究。虽然一些学者在综论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时，也涉及这一论题，但大都将“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简化为“十七年”中苏文学关系，基本上未论及“十七年文学”与欧美文学、亚非拉文学之间的复杂联系。在论述“十七年”中苏文学关系时，又多是将其归结为政治意识形态上“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反映，既没有对文学关系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又

少有理论上的深入分析，以至于不断重复着“十七年”中苏文学乃“同期对应”这一简单化结论。事实上，“十七年文学”不仅与苏联文学关系密切而复杂，并非简单的“同期对应”，而且与欧美文学、亚非拉文学等均有着特殊的联系。

“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是20世纪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关系，其目的诉求与该时期中国对于现代性的认知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性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是西方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政治上表现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及自由民主的出现，经济上体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社会结构上表现为世俗化社会的出现，文化上则为启蒙主义理性的确立。现代性“它首先是指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①。然而，随着世界上更多的民族、更多的国家步入现代社会后，现代性便开始获得超越其起源语境的更为丰富复杂的含义。换言之，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现代性，这种独特的现代性在内涵上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流动的。中国的现代性同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同艰难曲折的现代化历程，同臣民向人民演变之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内涵是具体而变化的。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外文学关系的走向与目的诉求。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拿来科学、民主思想，拿来个性解放思想，以进化论的观念审视世界，这些思想属于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范畴。它们相信这种启蒙理性能够将中国由封建蒙昧时代引导到现代社会。“五四”文学从总体倾向看，就是以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观照中国社会，对人进行思想启

^① 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蒙。鲁迅提出“立人”思想，相信文学是“为人生”的，应该给人以应有的尊严；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口号，要求写出灵、肉相统一的现代人；文学研究会崇奉文学“为人生”的观念，实实在在地以文学去描写人，以民主、平等观念启蒙人；创造社尊奉个性主义，以文学形式想象、表现具有自由个性、创造精神的人之存在方式。就是说，“五四”文学是反封建主义的文学，是“人”的文学，其中高扬的是启蒙时代“人”的主题，是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观念。与之相关联，“五四”作家与西方文学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以西方文学作为重要的借鉴、参照对象，进行文学创作。总体而言，“五四”时期对外文学关系的目的，主要在于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等启蒙理念及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以改造国民性，编织中国现代性蓝图；在于吸纳他国文学的艺术经验，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学，创造新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期间，中国的现代性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我们仍然尊崇科学、民主思想，仍然从进化、发展的角度观察世界，仍然相信理性的力量；但是理性的内容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启蒙观念，而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了深刻的反思、质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希望以一种更深刻的现代性来医治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病症，这种更深刻的现代性就是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不适合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时，构建起自己的现代性方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接受，意味着中国对现代性认识的深化。从马克思主义那里，中国人

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翻帝、官、封统治之后，便致力于将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引向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所以，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将中国改造、建设成为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新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是中国“新型的现代性工程”。正如汪晖所言：“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② 这一时期，由于世界处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峙的“冷战”之中，而国内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问题非常多，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所以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便与苏联缔结同盟关系，加入反资本主义阵营，同时加强与亚非拉弱小民族的关系，在国内则进行有步骤的社会主义改造，清除封建主义、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让人们获得新的社会主义观念，使中国真正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七年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服务的文学，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诉求的文学。

与之相关，“十七年”对外文学关系，相比于“五四”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全方位地发展同苏联的文学关系，

①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5页。

② 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建设经验，自觉拉开同欧美资本主义文学的距离。质言之，这一时期发展中外文学关系的目的，主要落实在捍卫、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引进、生产社会主义文艺话语上，也就是落实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新型的现代性工程”上，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替代了“五四”时期对外文学关系的泛启蒙性与艺术借鉴目的，文学关系相当程度上转换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关系。

本书在研究思路上，以“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为背景，将“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放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文学现代性追寻过程中进行阐释。首先，概论“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的总体情形、特征；其次，具体分析“十七年”文坛与欧美、俄苏、亚非拉文学之间的关系；再次，考察、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最后，研究“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民族意识和文学三层话语关系及内在特征，并对“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进行反思，总结其经验教训。在分析“十七年”文坛与欧美、俄苏和亚非拉文学关系时，又分别从文学交往、文学译介和文学影响等方面进行具体论述；关于海外对“十七年文学”的传播、言说，则依次从苏联、日本和欧美展开论述，既重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民族身份问题，又重视个体审美趣味在传播、解读中所起的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重视资料挖掘、梳理，以史料呈现“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的复杂形态，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辨，力求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在理论思辨上，综合运用比较文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文学跨文化传播接受研究，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研究意义：一、以“冷战”为背景，梳理、研究“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史，揭示其深层话语特征，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新世纪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在实践上具有参考意义；二、具体梳理、研究“十七年”与欧美文学关系，揭示“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与资本主义文学之间在矛盾对立中互相联系的特征，在学术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三、全面深入研究“十七年”中苏文学关系，特别是分析不同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文学上如何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身份话语关系，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四、梳理研究“十七年”与亚非拉文学之间一种政治文化性关系，无论是史料开掘还是理论分析，均相当程度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考察、研究海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对于中国学界深化认识“十七文学”，具有参考意义。

第一章

“冷战”语境与“十七年” 中外文学关系基本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关系破裂，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相继成立，世界进入“冷战”状态。“冷战”相对于“热战”而言，美国政府曾将它同“有限战争”、“全面战争”相提并论，认为“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以外的所有行动均属于“冷战”范围。为了遏止全球范围的社会主义潮流，镇压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择手段地推行“冷战”政策，激化政治意识形态对立，导致世界性军备竞争。“冷战”期间，两大集团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完全处于敌对状态，相互攻击、指责，水火不容。所谓“冷战语境”指的就是全球性“冷战”格局下的一种话语背景，一种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对峙氛围的国际性言说场景，相互对立、排他性是其重要特征。

这一语境相当程度上规约了新中国在“十七年”（1949—1966）对外文学关系的选择、走向与基本表现形态，使其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中外文学关系的独特景象，其总体特征非常鲜明，即政治意识形态化。然而，在这一总的特征后面，又存在着多重话语间的纠葛、对立或融合，使文学关系实际上变得相

当复杂，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客观空间与价值。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大会宣言》，号召作家们“坚决站在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里”^①，发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为争取世界和平与人民民主而斗争；同年10月，《人民文学·发刊词》要求：“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② 1953年，《译文·发刊词》以两大阵营对峙为背景，要求加强学习、借鉴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经验；1954年，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指出：“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实现亚洲及世界各国的集体安全、和平共处的伟大事业中，国与国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文学翻译工作，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环。”^③ 中外文学交流被看成是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其目的主要是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利益。

显然，跨语际的“文学”关系，在认识上被转换成为一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直接相关的行为，政治意识形态目的替代了文学审美建构，成为对外文学关系的基本诉求。

①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言》，丁景唐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19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13页。

② 茅盾：《人民文学·发刊词》，丁景唐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19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59页。

③ 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译文》1954年第10期。

第一节 中外作家非个人化交往

“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作家之间互访频繁，这种互访受“冷战”氛围影响，往往不是以作家个人之间的友谊为基础的私人性文学行为，不是以互赠作品为重要环节，而是一种超越个人艺术趣味的文学活动，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化现象。

20世纪50年代，中苏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认同，决定了这一时期两国作家关系非常密切。中国作家不断地去苏联“取经”，而苏联文学领导人和作家更是不断地来中国“传经送宝”。作家座谈会、经验交流会成为一种常见现象，而文学经验交流，往往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声援、倾诉同时进行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实际上第一位的。所交流的文学经验主要集中在文学如何书写社会主义生活，如何传播社会主义话语，如何生产革命的大众艺术，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等方面，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是一个被反复讲述的核心话题^①。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政治关系的紧张，作家之间的直接交往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是借助于各自的媒体，在意识形态层面相互指责，原来的互访被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

“十七年”期间中国作家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因政

^① 方长安：《论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语境中的嬗变》，《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治意识形态相互对立，文学观念难以兼容，直接的交往非常少，更多的时候处于隔绝状态，这与“五四”以后现代中国作家同欧美作家的关系不同。现代中国作家对西方文明，对书写文明进程的西方现代性艺术，从总体情况看，持认同、拿来态度；而在当代作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视野里，西方现代文明则因其资本主义性质而具有天然的反动性，所以这一时期中国作家与欧美资本主义作家失去了认同的重要前提，双方基本上处于敌对状态，直接的交往几乎不可能。在“十七年”中国作家眼里，欧美资产阶级作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御用文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他们的文学作品是资本主义腐朽意识形态的反映与表现形式^①。于是，作家之间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相互批判替代了真正的文学交流与对话。

“十七年”中国作家与亚非拉国家与地区的作家之间，直接交往较为频繁，这种交往在更多的时候是“冷战”形势下相互声援的一种政治行为，例如艾青同聂鲁达等南美作家的越洋相会，便是以反殖民主义为共同话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非作家会议，它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罕见现象。亚非作家基于某种一致的世界想象和艺术理想而走到一起，充分交流应对“冷战”现实的生存法则与艺术经验。中国作家通过与亚非国家、地区作家的对话，向亚非乃至整个世界表达了自己反西方资本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交流了中国新的艺术观念。亚非作家会议，实际上是亚非作家反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大集会，是寻找更广泛认同基础的联谊会，在这里文学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话语言说平台，一种为相互交流提供词汇和空间的特殊载体，文学创作本

^① 王佐良：《艾略特何许人？》，《文艺报》1962年第2期。

身不是言说的中心。

“十七年”期间，中外作家之间的交往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特征。这一特征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使作家们的对外文学行为获得了一种超越个人特点的社会性，作家对于社会的价值、意义不再是借助于文学作品来完成，而是通过在具有公共特征的平台直接言说得以实现。作家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由个性化艺术的创造者，变成了“冷战”话语的传达者；他们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即由政治边缘向政治中心位移。文学交往的目的超越了文学创作本身，承载着更为重要的时代使命。

第二节 社会主义话语诉求与文学翻译

“冷战”语境中的社会主义话语诉求，使新中国在“十七年”主要择译了那些表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题的作品，以及那些虽不是直接反映无产阶级生活，却具有内在的“人民性”能被有效地阐释进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内的作品。

“十七年”俄苏文学翻译，从数量上看，约占本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总和的半数以上，涉及的作家非常多，既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家作品，从流派、艺术风格上看极为庞杂；但从主题上看，那些作品则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古典文学中反映封建压迫，表现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作品；二是苏联文学中卫国题材的作品；三是歌颂十月革命的作品；四是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作品，均属于那种与新中国“十七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范畴、倾向相一致的作品。

俄苏文学翻译又以苏联文学为主，周扬曾在第二次全苏作家